



著名情报学家和信息资源管理教育家、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原主任王知津先生于2025年9月6日在湖北恩施因突发疾病不幸逝世,享年78岁。

王知津先生走上情报学学术之路始于上世纪70年代初。1972年3月,他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被选送到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学习,在校期间认真学习英语、日语,在专业上更是格外用功。毕业实践赴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从事情报编译报道,参与编写的《常用国外科技文献检索工具简介》一书于1975年12月出版,这是王先生的第一项情报工作实践成果。

1974年大学毕业后,王先生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图书馆科技文献检索室,先后从事中西文编目和科技文献检索与咨询工作。当时,图书馆情报工作刚兴起,王先生与同事合作编印《小麦育种》《低温冷害》等多种专题文献索引,以专题情报咨询的方式服务于农业生产与农业科技。1979年9月,王先生考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攻读硕士研究生,师从周文骏先生从事科技情报处理与检索方向的研究。1982年7月研究生毕业后,王先生到黑龙江大学工作,在校图书馆工作两年后,调入新成立的图书情报学系任教。1996年3月调入南开大学工作。他长期致力于情报学理论与方法、情报检索、竞争情报与竞争战略等方向的研究,是我国情报学学科的重要奠基人与开拓者之一。

中国情报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创建的。1956年10月,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成立;1958年,该研究所创办了中国科技情报大学。国家科技情报事业需要培养“耳目尖兵参谋”型情报人才,谋划情报学科和情报教育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情报学和情报教育得以真正发展起来。

王知津先生认为,情报学有三个支柱:一是情报检索,二是文献计量,三是情报研究。情报检索是情报学科最早发展起来的一个支柱领域。早在北大攻读研究生期间,他就与同学合作翻译了美国情报学家F.W.兰卡斯特的经典著作《情报检索系统:特性、试验与评价》,1984年出版,是我国信息检索研究的重要启蒙书籍之一。王先生是我国较早开展计算机检索研究的学者之一,发表了《简论手工检索与电子计算机检索》《情报检索系统性能评价》等多篇论文。编写了《计算机情报检索学》教材。著作《科技信息检索》2004年获第九届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并被广泛引用,对学科发展影响深远。2005年参与翻译出版了《现代信息检索》。2006年主持编写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信息存储与检索》。

王先生很早就对自动标引和文摘索引产生了浓厚兴趣,1982年完成了题为《汉语科技文献抽词标引研究》的硕士毕业论文,属于前沿研究成果。此后发表了《手工标引法与自动标引法之比较》《戈夫曼词现过渡与自动标引》《受控标引与非控标引评述》系列论文。他较早将国外文摘索引法介绍到国内,与人合作翻译出版了《索引的概念与方法》《文摘的概念与方法》等著作,主持完成国家教委“九五”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现代文摘索引法模式研究”,发表了《基于句子选择的自动文摘摘要方法及其评价》《从文本生成的角度看文摘编写》等论文。基于分类标引的知识组织是情报信息组织的进一步发展。为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王先生发表了《知识组织的研究范围及发展策略》《Web环境下个性化知识组织初探》等论文。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网络环境下知识组织理论与方法体系构建研究”,其成果《知识组织理论与方法》于2009年5月出版,是我国第一部有关知识组织的研究专著,对于创建知识组织学科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在文献计量领域,王先生重点研究网络计量学。2001年、2004年分别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上中文社会科学信息资源分布、评价与管理研究”和“基于Cybermetrics的中文社会科学网站综合评价指标与方法体系研究”,构建基于网络计量学的网站评价理论模型。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需要,基于情报研究

王知津先生与中国情报学



柯平



王知津先生的代表作

的竞争情报研究应运而生。2004年,王先生主持国家知识产权局软科学研究项目“基于竞争情报方法的企业专利战略研究——动态环境下竞争对手技术跟踪与监测”,提出竞争情报观、网络竞争情报、品牌危机中的竞争情报、竞争情报的价值链分析法。2005年,由王先生主编的《竞争情报》出版,系统阐述了企业竞争情报原理,讨论了情报系统、竞争对手、竞争战略、竞争情报法律法规、反竞争情报等重要主题,对竞争情报实践具有极强的指导作用。特别具有开创意义的是,王先生在企业竞争情报作战室研究领域始终处于国内领先地位。2005年翻译出版了《企业竞争情报作战室》一书,2007年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战争游戏法的企业竞争情报作战室设计模式与运行机制研究”,论文《竞争情报战争游戏法研究》获中国竞争情报学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一等奖。由于在竞争情报领域发挥着学术引领与实践推进的重要作用,王知津先生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授予“中国竞争情报杰出贡献奖”。

为发展情报学理论,王先生围绕情报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如情报性质、情报科学性质、情报的相关关系(人、情报与社会)等展开扎实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情报学家围绕情报性质有一场大讨论,公认情报具有知识性和传递性两大基本属性。王先生则提出相关性是情报的第三个基本属性,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研究情报、商品和使用价值的关系,提出“情报是一种商品”的重要观点。通过对情报学理论思潮包括信息哲学、现象学、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后结构主义、社会认识论等的剖析,提出了情报学元理论的“3C”主义。

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里,王知津先生致力于建立中国特色情报学学科体系,提出建构数字时代由理论情报学、技术情报学、应用情报学和管理情报学组成的学科体系;进一步又构建了数智时代更为详细的由内向外逐层嵌套的由四个同心圆组成的学科体系,是迄今为止为情报学最为完善的理论体系框架。他分析情报学发展的知识化、人性化、后现代主义三大趋势;认为我国情报学面临国际化与本土化发展的机遇与挑战,需要回归“大情报观”的视野,情报学核心使命仍然是“大情报观”视野下的情报研究;提出我国情报学应加强学科话语统一性和对外话语影响力,学科独特性和不可取代性应当进一步强化,力争实现学科国际化与本土化均衡兼顾的良性发展目标。几十年来,他始终坚守情报学的初心,始终坚持情报学服务于国家战略、为中国情报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知津先生长期从事情报学教育与学科建设,是黑龙江大学和南开大学两校情报学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与领导者。在黑龙江大学任教期间,当时全国的情报学教育刚刚开始,各地都在探索,王先生具有超前意识,积极协助和配合系主要领导,组建师资队伍,革新课程体系,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国内较早开设了《计算机情报检索》《文摘索引法》《专利情报》《经济情报》等新的情报学课程,并编写出一批教材。1988年在全国较早创办了“信息管理”和“情报情报”专业。他组织教师开展情报学研究,主编《新编英汉科技文献缩略语大词典》(1995年)。注重学生科研能力培养和教学实习基地建设,开设《科研方法与论文写作》课,每年举办一次全系学生“‘五四’科学讨论会”。

30多年前,时任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系主任钟守真慧眼识才,将王知津先生调入南开。彼时南开图书情报学科正处于艰难时刻,王先生作为系主任,协助系主任渡过难关。后院系调整,信息资源管理系并入国际商学院并改名图书馆学系。王先生任国际商学院图书馆学系系主任后,开始大力抓学科建设,引进人才,创办档案学专业,获得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图书馆学博士点及情报学博士点,逐步构建起学科体系完整、人才梯队健全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使南开大学成为国内该领域学术重镇。退休后,王先生仍然十分关心学科建设与院系发展。2025年2月,我向他报告他的学生樊振佳刚刚接任信息资源管理系系主任,他说:“这是好事!‘60后’交‘70后’,‘70后’交‘80后’,一代传一代,后继有人了!”他常跟我说,一个学科、一个院系的兴衰关键在掌门人,在学科带头人,不仅要守得住,还要谋发展。

王先生一向重视学生会工作,是国内情报学会的重要组织者和学术活动的策划者。他还积极参与地方专业学会的工作,特别是指导青年学者申报项目、发表论文,总是激励青年人要努力去做,要做就一定要做成功,不能轻言放弃。他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的老专家,每次评审回来,总要跟大家说说今年哪些青年人拿了项目、天津又拿了几项,他的心中始终装着一份青年学者的成长记录、一张天津社会科学的发展图谱。

从教三十余载,王先生始终坚守教学一线,潜心学术育人,编写国家级规划教材,为我国图书情报与档案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博士、硕士和本科人才。他的学生中许多人已成为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学术骨干与行业中坚。

王知津先生是天津社会科学界的一位“大先生”,是中国情报学的一位“大先生”。他一生致力于中国情报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崛起,治学严谨,勇挑重任,其学术洞察力、前沿创新思维与科研组织能力堪称学界楷模。他为人宽厚豁达,为学孜孜不倦。就在今年7月中旬还出席了在西安召开的中国情报学年会,8月底还在中山大学召开的全国信息资源管理博士论坛上作会议总结。

王知津先生留下了一种精神,是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学科奋斗精神。斯人已逝,精神永存。

(作者系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津沽学人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天津日报 合办

学人小传

王知津(1947—2025),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历任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主任、南开大学情报科学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兼任天津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校教授。曾担任教育部图书馆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档案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常务理事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索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理事、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译出版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情报学报》《情报科学》等多家核心期刊编委。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出版专著33部,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及其他省部级科研项目共16项。

翻阅天津地方志和风俗物志会发现,清朝初叶,在风景如画的南运河北岸有一座备受文家和诗人称道的艳雪楼。艳雪楼,亦称“佟家楼”,在今红桥区邵公庄附近,乃天津古代胜迹之一。遗迹虽已不存,但一些咏艳雪楼的诗作却能让今人在阅读中想象那座建筑。艳雪楼之所以为人们推崇和关注,盖与其头有关。清乾隆时汪西颢《津门杂诗》云:“楼头艳雪莹如玉,每课新诗到日西。不尚书有吟盼,白杨作注背灯啼。”写的就是艳雪楼。诗后有小注:“妾赵氏,字艳雪,色艺兼擅,筑楼贮之,名艳雪楼。”艳雪楼实为清初著名文人佟毓为一位叫赵艳雪的女性诗人所建造。

佟毓,字蔗村,号空谷山人,又号已而道人。清代长白人。父任河南布政使,兄弟六人皆居官。佟毓以国子监通判,不愿谒选,遂迁居天津。建宅于城西卫河之滨,题曰“沧浪考槃”。在这里,他布衣葛屨,忘为贵介,过着清悠俭朴的生活。

佟毓笃情重义,为人耿介,且不畏权势,不同流俗,常助人于危难之中。广东番禺屈大均为明清之际著名学者、诗人,清军破广州,他遁入空门,行游南北,交结遗民,不久又弃禅归儒,继续抗清,为清王朝所追捕。出身贵介的佟蔗村与屈大均均过从甚密,不但赋诗酬和,而且在屈氏病危时,慨然将其四子明渲收为养子,视为己子,为谋婚产。屈大均曾作诗《佟声远友兄爱予第四子明渲特甚,劝养为己子,病中赋诗六章,敬以托之》。诗中有“一日相知成肺腑,两家敦好结婚姻”和“定知恩爱长加隆,看似亲生一丈夫”句,可见二人友谊之深。山东孔尚任用十余年工夫完成了旨在反映南明一代兴亡

的历史剧《桃花扇》,一时轰动文坛。包世臣于《艺舟双楫》中言:“近世传奇,以《桃花扇》为最。”然起初剧本仅以抄本传阅。孔尚任《桃花扇本末》称:“《桃花扇》抄本久而漫灭,几不可识。津门佟蔗村者……薄游鲁东,过予舍,索钞本读之,才数行,击节叫绝。倾囊囊五十金,付之梓人。”《桃花扇》这一名著得以抄本变为刻本,从而“泛流传,要即叩佟翁慷慨助。”

佟毓善于作诗,各体擅长,而尤精五言。清《乾隆》天津县志》卷十八《人物·流寓》说他“性嗜山水,耽吟咏,早年诗学苏陆,一变而入大历、贞元之室,津之能诗者未有过之”。佟毓之妾赵艳雪也工诗,是清前期被诗家公认的诗坛女杰,亦常有绝佳之作。据载,水西庄主人查为仁宴金至元病故,查氏作《悼亡姬》诗,和者甚多,其中尤以赵艳雪七绝最佳。该诗结句云:“美人自古如名将,不许人间见白头。”用意新奇,“与宋笠田明府‘白头从无到美人’之句相似”(袁枚《随园诗话》),极受诗界夸奖。佟毓因爱其诗才,特筑艳雪楼供其居住。清乾隆中叶,随着主人的亡故,艳雪楼渐给人以荒败之感,但仍不时勾起文人诗家对旧楼往事的追忆。当年津门诗画名家金玉冈便多次到邵公庄,流连于艳雪楼,曾作《过佟蔗村艳雪楼故居》:“共沿流水到篱根,燕雀喧喧最小村。几点红芳遮破屋,满庭青草闭闲门。缥緲散尽残书帙,樵牧唯余旧子孙。艳雪犹名楼已废,海棠一树最销魂。”抒写了彼时艳雪楼的情景和内心的感受。

有清一代,艳雪楼始终盛名不减。据说道光年间有位来自京城的落第秀才叫张问荷,此人到艳雪楼故地,喜其人地双雅,于是便设野茶馆于其左近。茅草为棚,备桌椅茶具,人饮者花费甚少。张为引人入胜,设香灯谜为戏,中者敬一字一画或笔墨文具;不善猜谜者,主人则备象棋,供人手谈。诗人梅小树题其门曰“雨来散”,李廉杨无怪题联曰“吃半杯无分你我,下一盘各自东西”。此事在津城传为美谈。



秋雨清趣(中国画) 刘家栋

我家南隅有小山,山上有一玲珑亭,朱红四柱翘角八檐,赭色匾额上书“雨花”二字。字为狂草作阴刻,填绿松石,如云似水,抢着从匾额边上飞蹿出去,抓都抓不住。山上植满金海棠,早春,枝杆向上启花蕾,细腻,精致,清奇。一缕缕茸绿的丝线串起一颗颗嫣红的玛瑙缀在枝头上,海棠一瞬就让人记住了它。春分,花开得热闹拥挤,悄声中,春风点花如雨,点点滴滴。夏时,阴晴不定,正午日当头,常有过路雨,“道是有晴却无晴”。雨连地起连漪,暮回首,飞虹映雨似花,时辰停歇,尘喧遥远。

秋分时节,同学毛伍来家做客,他是美术学院高材生,风趣幽默,文气十足,现为本埠最具朝气出版社的美编。我请他上茶室品茗,两人临窗面南而坐,望向不远处浸映在色彩中的亭廊,毛伍的话明显多了起来。说起年初参加全国少儿图书装帧比赛,他参赛的作品是为一位海外著名华人作家《少年

近日收到袁帆学长发来的文章《天津戈登道27号的清华抗战秘闻》,拜读后感慨万千。作为一名南开学子,近半年来我却走上了苦苦追寻清华天津同学会旧址之路。这一切都源于2024年与袁学长在昆明西南联大旧址结下的不解之缘。

2024年10月26日至11月2日,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校友组成“湘黔黔毅行团”,沿着当年西南联大西迁路线,用7天时间完成1800公里行程,以“重走联大之路”向87年前的“教育长征”致敬。

我因工作原因未能全程重走联大之路,但有幸于11月2日与“毅行团”在昆明西南联大旧址会合,特别是有缘与袁帆学长相识。交谈中获悉,袁帆学长系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1975级校友,被清华聘为“清华史料和名人档案征集工程”特邀顾问。当他听说我来自天津时甚是兴奋,特别嘱托我帮他查找清华天津同学会旧址,我欣然答应回津全力寻找。

2024年11月10日,袁学长发来微信讲“刘校友好!一周前我们在昆明相识,谈到清华天津同学会旧址的确认问题,现将我上半年的调查报告转发给你,供参考”;同时,他特别说到调查重点是“这幢房子当年是谁投资兴建的”和“产权归属、门牌号码、租住用户”等变迁情况。他原以为天津市档案馆中有所记载,但很遗憾未查到,所以他对我抱有很大希望。我深为袁学长精益求精的严谨作风和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所感动,也深感责任重大,从此开始了对“戈登道27号”的探寻之路。

首先,我从海量开源信息中查明“戈登道即为湖北路”,并找到了《天津英租界道路原名》等相关佐证。1890年,英租界当局为纪念在开辟和规划租界中有过贡献的戈登,将竣工的工部局大楼命名为戈登堂;1897年,英租界扩充时将新建成的一条路命名为戈登路(亦称戈登道),并将这条路排序为13号路,另外,将与戈登路相连,自重庆道至南京路的路段命名为怡丰路;1946年,这两条路被合并成为今天的湖北路。此外,我从大量史料中厘清了“戈登道27号并非现在的湖北路27号”。湖北路27号原址据悉曾是醇亲王载沣故居,现为天津文学艺术研究所等单位使用。

其次,为了彻底查清清华天津同学会会址的真相,2024年12月11日,我特地去了天津市档案馆,看能否查找到相关历史线索。不久,档案馆工作人员经过深入查找,终于获得许多线索,包括:

1.在卞僧慧所写《天津英租界的两个抗日据点》中提及“一处在戈登道13号路(今湖北路),叶企孙先生以清华天津同学会为据点,支援冀中抗日活动”。

2.吴宓日记记载:“又悉叶企孙在天津住 State Hotel Race——Courserd(英租界,维多利亚路191A,第3号套房)。”

3.1949年清华同学会天津分会在民政局的登记表,其中登记地址为“湖北路31号”。

4.还有回忆文章显示,湖北路13号为义源货栈,15号为达明医院,17号为万生银号,19号为清华同学会公寓。

根据这些线索,虽然可以确定清华天津同学会会址在如今的湖北路,但关于具体地址的表述相互并不一致,到底是史料有误,还是确有变迁?抑或另有他情?这些矛盾点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一时间查找工作似乎走入了盲区。

2025年6月25日,查证工作出现转机,天津市档案馆和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对已有线索进行了梳理分析。首先尝试查阅民国天津城区图、民国报纸数据库,但均未能找到精确到牌号的文献信息。然后改变思路,尝试寻找当时亲历者或其他知情者的描述信息,后找到了钱伟长、叶企孙、吴宓等1937年到访过“清华同学会”的记载,确认了“戈登道27号”是清华天津同学会所在地。最后,又找到一些2000年后的资料,关联起来综合分析,基本可以确认今湖北路19号即清华天津同学会旧址。比如,清华大学1937年毕业生苏良赫所作《早年在清华学习和工作的回忆》一文中提及,同学会临街,对面是一个大体育场,本身是三层楼房外加地下室。阎裕昌孙女阎美红2022年8月在北京青年报》上撰文《怀念在抗战中牺牲的祖父阎裕昌》提及,1937年10月,阎裕昌从北平来到天津,将清华实验室的稀有金属镭交给叶企孙,见面地点就是在英租界13号路戈登道上的天津清华大学同学会小洋楼院内。

还有,2010年8月《每日新报》所刊《钱伟长天津故居被发现 寄居天津期间一直教书》一文中写到,清华天津同学会所在地在湖北路19号是经过证实的,加上居民冯培焰老先生详细的口述和证明,判断出湖北路15号就是钱伟长在天津时的居所。

另外,1934年5月30日《大公报》登载的一则广告信息,也证明戈登道27号是清华天津同学会地址。

我旋即将上述信息发给袁学长,他回复:“非常感谢!《大公报》广告让我确定了‘戈登道—13号路=湖北路’,阎裕昌后人回忆也基本可信,特别是右边套和左边套的区别,也是认定的关键条件。”

为了印证查询和研究情况的准确性,我先后多次走街串巷、深入现场实地调研、入户走访、拍照留存,并及时把进展情况告诉袁学长。

2025年7月23日,袁学长给我发来他新撰写的文章《1937:天津戈登道27号的清华秘史》,他说“我花了些时间,整理了一篇文章,您先看看,是否说清楚了?其中特别是熊大缜和北大沈仲章合作抢救国宝,这是过去不知道的历史事件”。7月28日,袁学长又特别叮嘱我,“最好能进入19号,掌握基本布局,包括几个房间、楼梯样式等。只要布局符合史料,就更有说服力了”。

转天一早,我再次进行实地走访,与居住在湖北路19号院的两户居民以及17号院的居民冯大爷深度交流,并查看了19号院每层的房屋结构,均与史料完全符合,最终确认湖北路19号即清华天津同学会旧址。

袁学长科学严谨的治学之道、谦虚谨慎的品格和对历史真相的执着探寻,无不体现出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精神,令我感动和敬佩。通过这次查找工作,我们俩也成为忘年之交。至此,我心中久悬的石头终于落地,总算没有辜负“让历史呈现本来面貌,让英雄之光重放光芒”的美好愿望,也为“重走西南联大路”增添了特别的意义,更是用实际行动对可歌可泣的全民抗战精神表达了应有的“缅怀、敬畏、景仰”。

袁学长在《天津戈登道27号的清华抗战秘闻》一文开篇即提到,“天津英租界,一个浓缩了中国近代史的概念;戈登道27号,一个富有时光感的日子地址,当二者一起叠加在‘1937’的历史天幕之上,却成为一段清华抗战秘闻的代名词”。我们苦苦追寻清华天津同学会旧址,就是为了深入挖掘清华师生抗战南迁的传奇故事,为了永远纪念那段发生在小洋楼里的斗争历史,为了永远不能忘却西南联大为中国抗战作出的重大贡献。

树影婆娑,光影变幻,面对这处见证了清华人一段抗战传奇的小洋楼,我深深感到,这里的一砖一瓦似乎都充满了不能忘却的历史意味。感受如今的岁月静好,更要铭记英雄前辈为抗战胜利所付出的流血牺牲!

题图:湖北路19号清华天津同学会旧址今貌



刘松林

与雨》一文所作的插画题跋,其中艰辛,感触良多,画稿废了几张,还是不得法,连自己都看不下去了。一日,冥思苦想中脑洞大开:放下身段拜师傅,师傅何许人,自家儿子是也。

小亮,毛伍的崽,一年级小学生,聪明写在脸上,机灵把弄手中,充电三分钟,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儿。资深美编重新打理,按小孩的笔触画出“雨中少年”,交儿子临摹,那不是临摹,是创作,是天才的创造。童子把自己置

清华天津同学会旧址追寻记

刘新强

